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文学理论研究

## 中国当代小说死亡书写的发生

【作者】岳凯华 刘雪姣

人作为自然的一种存在，有生亦有死。西方《约伯书》中的一个故事告诉人们，死虽能极尽能事地被延迟，但不能被否认。死亡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一个事实，也是古今中国哲人、文人一直探讨的话题。从哲学层面的探讨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甚至来自外域却本土化了的佛教，都对死亡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儒家提倡道德理想主义的生死观，注重生死的社会价值，“强调从有限的社会人生中，创造生死的意义”；道家提倡自然主义生死观，注重生死的自然状态，“力图摆脱社会生活的纷扰和限制，从归属于自然的无限中超越生死”<sup>①</sup>；佛家则提倡生死轮回，注重自我内里的清静，从而达到涅槃的幻想境界。就文学艺术层面的叙说而言，自古代神话始，死亡就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人写进了文学作品。文人们怀着各自不同的对死亡的心灵感悟，以各自的手法或方式书写着死亡。在漫长的中国文学长河里，有古代神话夸父的“道渴而死”、蚩尤“遂杀”的原始死亡，有《诗经》中的“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的殉葬描写，有现代作家鲁迅、郭沫若、沈从文、郁达夫等笔下的死亡书写。从死亡认知和书写发展脉络的简单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代小说死亡书写的发生，既离不开中国深厚的文化渊源的影响，又必然受当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制约。

—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②</sup>。中国当代小说死亡书写的发生自然不能割断与儒、道、佛生命哲学的规训和制约。上述这三家的生死立场，从不同层面影响着中国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

### 1. 儒家思想与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

儒家对生死的思考，来源于《论语·先进》中的“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这句话，看似简简单单，实则含义深刻。由于死亡是人生不可经历和体验的，孔子才重视生，认为只有把握了生才能把握死，《周易·系辞传》所云的“原始返终，故知生死之说”就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儒家是从反思生的价值这一角度来看待死亡的。在儒家视域中，凡人应该立德、立功、立言、立行，践行人伦之道，以使生命至善、至美。如果生命获得了这个意义，即使面对死亡，“一切恐惧烦懣都将冰释，惟有一种快慰充满内心”<sup>③</sup>。所以，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仁者无忧”（《论语·子罕》）。而“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之类的意味深长的生死阐释和思考，表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乃“儒家死亡观的最高标准，也是他们提倡的人生最高境界”<sup>④</sup>。

在儒家思想的浓厚熏染中，当代中国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在有关死亡的书写中，总将死亡与人民、国家、民族等话语纠缠在一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小说里的英雄，都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兴亡，不惜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如江姐就义前，从容镇定，细心梳好头发，换上旗袍毛衣，微笑着向战友们告别，庄严地实践了自己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163]

评论数[0]

的誓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正是儒家“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sup>⑤</sup>的传统精神之折射。孟子曾经说过，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当代作家笔下的革命英雄无一例外都是“当大事”的人物，为了民族、国家，心中则具当死则死的非凡气概，譬如为保护群众英勇献身的高波（《林海雪原》），舍身炸敌堡的刘大顺（《东方》），冒生命危险帮女兵架线、自告奋勇充当战场指挥、遍体伤痕视死如归的刘毛妹（《西线无战事》）……他们和江姐一样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儒家的传统生死观念，真正做到了“义无可舍之理。当死而死，义在于死；不当死而死，义在于不死；无往而非义也”<sup>⑥</sup>。

## 2. 道家思想与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

老庄道家的死亡观念，富有诗意和超越气度，充盈着玄妙的思辨色彩。《外篇·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又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内篇·齐物论》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一面承认死亡的客观性，一面将生死统一起来，认为“生死一体齐同”，从而超越生死，填平生死沟壑，达到对生死的冷漠静观。正如今人所云，老庄“将死亡描述得比生存还美，还富有自由活力和精神欢乐，无论他与骷髅的对话，还是他对亡妻的态度或面临死亡的坦然，他都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信仰：死是审美性质的，它属于美的最高的虚无状态和悬浮状态，也为精神极大的审美自由，只有在死亡的体验中才真正体悟到美的快乐和真谛”<sup>⑦</sup>。总观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女性作家海男、陈染、林白、张烨等对待死亡的态度和处置死亡的方式颇似庄子。海男说：“死亡在我的想象中就应该是美丽的，它应该像普拉斯所讲的那样，死亡是一门艺术。”<sup>⑧</sup>在她们的笔下，人的死亡，或如一场优美的表演，如林白这样描写秃头男人的死：“鲜血立即以一种力量喷射出来，它们呼啸着冲向天花板，它们像红色的雨点打在天花板上，又像焰火般落下来，落得满屋都是，那个场面真是无比壮观”（《致命的飞翔》）；或者荡漾着梦幻般的诗意，如海男让疯子阿林以生命的陨落尾随蝴蝶的飞翔（《蝴蝶》），让身着白连衣裙的漂亮阿姨冰凉的躯体上栖息着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圆面上跑遍》）。此外，余华、苏童、叶兆言等男性作家笔下的一部分死亡书写，也具有审美的性质，像道家一样以美化死亡的方式去消解死亡，表现了一种死亡的无痛苦的美。

道家提出，人应该重返生命的本真状态，与道同一；以虚静无我之心，饮之太和；在逍遥自得的心境中，与大自然朴素相处。当代一批作家同样重视生命向大自然的回归。陈忠实的《白鹿原》借白鹿在原坡上的消失，暗示朱先生的辞世是灵魂向大自然的复归；赵玫的《岁月如歌》借“他”和“她”之嘴，道出对A的死亡的评价：“他的死也很浪漫很不朽很超凡脱俗……他是个很诗意的人……死亡是他最理想的境界。所以她才把A送回到了这片有了A才完整的美丽洁净的大自然中……A一定会认为死和回到这大自然的家园是他最理想的境界”。死、回到、大自然、最理想的境界，这些字眼正表征了作者对待死亡的态度。这与道家的“死是休息”和“死不过是寝于天地巨室，回归其本始本真”<sup>⑨</sup>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老庄常以一种冷静超然的心态对待死亡，“鼓盆而歌”即是例证。面对惠施的指责，他那“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无本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形也”的坦然辩解，显示其对于死亡的独特哲学领悟，也表明他对于死亡现象的一种艺术和美学的态度。老庄的这种拉开自身与死亡现象之间的距离，“冷静超然地旁观体察而不介入情感与观念”的做法<sup>⑩</sup>，影响到了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洪峰、方方等当代作家，他们自觉保持主体与死亡现象之间的审美距离，正如莫言在论及《檀香刑》中血淋淋的死亡场面时所言：“能支撑着我写下去——甚至写凌迟、写整个檀香刑的执行过程，是因为我实际上是把它当成‘戏’来写……我在写戏写剧本时，自己首先有一个审美的距离，我希望读者在读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距离”<sup>{11}</sup>。莫言的这番表白，还代表了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作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她们均让小说的叙述者以一个活着的局外人的角色来讲述记忆中的亡灵故事，用一种超然的追忆似的姿态叙述死亡，将死亡的压迫、亡灵的恐怖置于记忆的隧道，让之随时间的流失而逐渐化解。

## 3. 佛家思想与当代小说中的死亡书写

佛教很看重生死，尤其把死看成最严重、最首要的问题。对它的思考，使佛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死亡思想体系。

按佛教的理解，死只是人的肉体的消亡，灵魂是永不泯灭的，不灭的灵魂可以再生人世。所以，死只是再生之前的一种状态，是轮回链上的一环。人要再生，彻底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就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彻底灭除烦恼生死的业因，进入一种“涅槃寂静”的境界。当代作家史铁生很相信佛家的死亡观。他说：“跟我们具名的肉体没多大关系，但是灵魂永存”，“灵魂栖居在我们的肉体上”，“死也不是结束”。{12}“诸行无常”是佛教的三大义理之一，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处于相互联系的永无休止的迁流变动中，一切事物包括人生都是无常的，史铁生的死亡观念与此甚为相似。他认为，人具有物质的波粒二象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运难测”{13}。“命运难测”，正是他对佛家诸行无常人生的领悟。这种人生的无常，在他早期小说《宿命》、《草帽》、《中篇1或短篇4》中处处可见。而颇好死亡书写的余华，也在自己的文本世界中大肆渲染生死的偶然性与命定性。这种偶然性与命定性，又预示着人生的无常。譬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明，由哥哥身后的拖尾巴变成了村里孩子的领头人，正洋洋自得享受权威的喜悦时，一场意外却夺走了他小小的生命。他的死，是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这种救人的行为，“来自于他对那几个七八岁孩子的权威”；而孩子的落水，又是因为对于水的迷恋。在这里，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因缘造就、相依相成的。

佛家对待死，和道家一样坦然。不过，道家把死看作是休息和回归自然，佛家则把死看成是通向涅槃或来世的中介，“在‘还灭’途中，人可获得生命的最高境界，可证得涅槃之际那一刹那的圆满、寂静、光明、真性湛然、圆周一切”{14}。死亡是生命的升华，是苦难的解脱，是一种超越的大欢喜。史铁生笔下人物的死亡，可以说是一种佛教式的死亡体验。不管是《中篇1或短篇4·局部》中的“我”或老头，还是《务虚笔记》中的女教师，面对死亡都是无比的平静与超脱，特别是其中一生充满了佛的色彩的女教师，她在生命即将结束前，还“以百倍的虔诚参禅悟道，沉思冥想，仰望佛门”。

## 二

“文学是一种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15}。当代小说死亡书写的发生，自然也离不开时代的影响。时代环境直接造就这个时代格局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构成了当代小说死亡书写发生的现实原因；而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制约着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模式，这构成了这类书写发生的深层原因。

### 1. 现实原因

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6}文学是人类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凭空产生。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受制于一定的时代环境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也不可能摆脱上述限制而发生。

首先，革命战争生活不仅为死亡书写提供了素材，还造就了大批书写死亡的作家如梁斌、杨沫、罗广斌、杨益言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连绵战火营造的特殊时代环境，使当代不少作家“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切的感受”，以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17}他们耳闻目睹了革命英雄的勇猛、坚定、视死如归和悲壮献身，这些英雄连同战争的场景在作家的头脑中成了永恒的回忆，而回忆又时常激励着作家内心强烈的写作冲动。雁翼曾说：“我所以能够从事文学创作，完全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对我‘塑造’的结果。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的现实生活首先把我‘塑造’成了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才有可能把我被‘塑造’过程中众多的感受和材料，提炼、概括、改造、升华成文学作品。可以这么说，一个作家怎么写，形式可以百种千样，但写什么，却总是受着他自身的经历所左右。”{18}杨益言也强调监狱生活对写作《红岩》的影响：“这部小说的真正作家不是我们，而是无数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我们只不过作了一点记录整理工作。……大概可以说，小说着重塑造的几个英雄人物许云峰、江姐、成岗，以及小说写明是牺牲了的同志，包括齐晓轩、余新江、刘思扬、龙光华、丁长发等，都各有其生活原型，都可以从牺牲在重庆集中营的烈士中找到。”{19}

其次，知识分子“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诱发了“文革”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对于死亡的集中书写，如卢新华的《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韩少功的《爸爸爸》。尤其使



得那批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苏童、余华等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大肆地描写死亡，因为他们目睹了“全民族沉沦于空前浩劫的噩梦之中，人性丑恶的一面正以某种神圣的名义而大肆表演，种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在最辉煌的理论装饰下而得以横行无忌的现实图景”{20}，这种噩梦般的记忆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再次，当代中国是女性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中国女性经历了几千年的压抑，而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中仍然觉察到女性生存的困窘，而死亡是最能表现女性生存困窘的。此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尤其是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中所挟带的痛苦的死亡风暴则直接启迪着、激荡着、复苏着一代女性作家身体和记忆中充塞的亡灵的身影和声音。于是，当代中国女性作家在她们的文本中大肆地描写着死亡体验、死亡寓言、死亡艺术，“死亡抒写仿佛童话王国中那双魔力无边的红舞鞋，构成了女作家们难以摆脱且不愿拒绝的诱惑，一种无形而有力的牵引，并由此演绎出历史上第一次对死亡主题的不约而同的女性的言说”{21}，如海男的《横断山脉的秋祭》、翟永明的《死亡的图案》、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等。

此外，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愚昧、落后、男尊女卑等观念仍然在社会上盛行；一方面，人们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消极的思想，比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这两方面的消极思想，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的震荡{22}，使作家们“直面经济转型期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抒写死亡，“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及置身于这些矛盾和问题之中的人生的种种困境与尴尬，表现他们对于变革时期的社会人生的真切的‘人间关怀’”{23}。贾平凹的《浮躁》，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严歌苓的《谁家有个女初长成》等就是这类作品。

## 2. 深层原因

首先，中国当代小说的死亡书写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发生的。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当代文学就“开始被纳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事业之内，成为为这个事业服务和这个事业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在这样一种政治影响下的文化氛围中，一批肩负使命的作家们书写了一大批真实生动感人至深的革命英雄的死亡。不管是前“十七年”红色经典题材小说文本中的江姐、许云峰、林红、江华、高波……还是“文革”后革命题材中的扬雪、王大发、刘大顺、梁三喜、勒开来、刘毛妹……他们“死得其所”，无怨无悔，是革命理想和境界的艺术体现；他们高扬了时代精神，激励着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进取、奋发图强；他们集中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容量和社会特点，蕴含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具有一定的时代内涵。即使是伤痕、反思小说，也因积极响应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它们中的死亡不仅表征着人的机体的死亡，而且还象征着一个苦难时代的结束，具有控诉的力度。正是在后一种死亡意义上，死亡在伤痕、反思小说中也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时代内涵。

其次，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经历了一个由“人”的缺席到“人”的在场的历程，作家密切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死问题也乃理所当然。当代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打上了极深的政治烙印，被看作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和工具，它要传达的是一种政治群体或阶级的声音而不允许掺杂任何不属于这个群体或阶级的个人因素。要是文学作品涉及了个人因素，描写了人性、人道主义，必然会遭到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批评。{25}所以，在当时，人，尤其是作为最真实存在的个人的主体性在文化中始终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文革后，这种状态得到了改变：思想界和艺术界大可认真思考和关注人的问题，并且还逐渐带动了整个社会对人的问题的正视和重视。而中国经济的转型，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文化结构的全方位转换，再加上当代西方有关人的哲学与文化思潮的影响，人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重视，人的主体性日益凸显出来，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一大批作家从死亡入手表达对人的终极关怀。或让死亡负载起审视与批判文化的功能，陆文夫的《井》、东西的《不要问我》、莫言的《冰雪美人》、方方的《奔跑的火光》等批判了把人默默逼向死亡的传统伦理文化，而贾平凹的《废都》、《浮躁》，邱华栋的《哭泣游戏》、《新美人》等则写出了现代都市文明中的消极因素，揭露金钱欲、权力欲、情欲、色欲招致人格的堕落；或借死亡表现人性的负面因素，如余华的《现实一种》、《死亡叙述》、《难逃劫数》，苏童的《米》，残雪的《黄泥街》等；或消解死亡的终极意义，如余华的《偶然事件》中两个男子的死亡厄运，《一个地主的死》中少爷王香水横遭杀害。在这里，死亡不仅远离了崇高，甚至丧失了它可能具有的哀怨。

### 注释

①宋希仁：《人生哲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

页。

③胡木贵：《儒、道生死观异同论》，《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

④朱立言等著：《哲学与当代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⑤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91页。

⑥《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⑦⑩颜翔林：《死亡美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91页。

⑧张钧：《穿越死亡，把握生命——海男访谈录》，《花城》1989年第2期。

⑨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11}{12}陈骏涛：《精神之旅：当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第64页。

{13}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14}谭桂林、龚敏

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05页。

{1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16}《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7}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18}雁翼：《生活感受与创作》，《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9}杨益言：《关于小说〈红岩〉的写作》，《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页。

{20}赵树勤：《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1}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

页。

{22}张桂岳、葛文进：《时代热点的哲学沉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45页。

{23}{24}於可训：《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第9页。

{25}岳凯华：《回眸“十七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1页。

【原载】 ■《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3期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建于1956年，已

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有50余年办学历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http://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http://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mailto: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